

人文
学术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杨莉馨 著

寻求中西文学的会通

In Search of Thorough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复旦大学 出版社

杨莉馨 著

寻求中西文学的会通

In Search of Thorough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求中西文学的会通/杨莉馨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5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11625-0

I. 寻… II. 杨…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9712 号

寻求中西文学的会通

杨莉馨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33 千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625-0/I · 933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总序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终于将陆续与读者见面。从动议编辑这套文库到如今变成现实,其中真是颇多可感怀之处。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中生代”比较文学学人一次小小的集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我们献给自己师长们一份迟交的作业;“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又是我们给各位同仁、乃至更年轻同行们发出的对话与批评的邀请。

多年的酝酿筹划、多年的协同努力,使我们逐步将自己的工作与更深远而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联系起来,并开始慢慢融入其中。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无不受惠于祖国的开放改革,受惠于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受惠于同辈间的切磋琢磨。我们是这十五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段文化积淀的受益者,也是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习者和无比幸运的历史见证者。我们也许注定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但我们却也应是承先启后的“桥梁”,必须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而这里记录的正是我们探索行进的脚步,也是我们对自已所从事的学科一点微末的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走向(进)世界”的历程,给了我们思考过去、筹划未来的“底气”;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为我们准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学科建制。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以之与我们所属的学科名称相呼应,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打破界限,超越学科、语言与文化的限制,乃是我们比较文学学人的使命乃至宿命。是的,我们无疑拥有不同的学术爱好、志趣和观点,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把我们联

系在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世界语境中，以比较的眼光，从多学科视域，面对并尝试回答我们所浸润其中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德不孤，必有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富于活力和学术追求的知识与精神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要送上我们衷心的谢意。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与这套“文库”相呼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辑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系列”等姊妹项目也已次第启动。

在“文库”陆续面世的这个特殊时刻，先贤们的声音似乎又一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文化的崛起须“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响应先贤的号召，集结这套文库，仅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取今复古”“扩大恢张”的行列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希望我们会有继续编辑以后各辑的荣幸。

是所望也，谨为序。

编者

2013年5月初稿

2014年4月修订

目 录

第一辑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 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双重落差与文化学分析 3
- 命名的困境与阐释的焦虑：关于中国女性文学写作的界定研究 17
- 女性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写作中母性主题的演变 34
- 弗·伍尔芙的影响与汪曾祺早期的意识流小说实验 45
- 伍尔芙与中国当代妇女作家的亲缘关系 58

第二辑 翻译研究

- 现代中国对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77
- 论“京派”作家之于伍尔芙汉译与接受的贡献 92
- 论《学衡》的文学翻译与文化抉择 102
- 论《学衡》诗歌译介与新人文主义 114

第三辑 跨学科研究

- 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美学探索与俄罗斯艺术 129

“尼莎拥有我渴望的一切”	
——论贝尔绘画艺术对伍尔芙创作的影响	140
“我们拥有同一双眼睛”	
——论贝尔绘画艺术与伍尔芙美学探索的关联	153
“用文字来表现一种造型感”	
——论罗杰·弗莱设计美学对伍尔芙小说实验的影响	169
伍尔芙小说作为“有意味的形式”	184

第四辑 英语女作家研究

灵魂的撕扯与爱略特小说的内在矛盾	205
《远航》：向无限可能开放的旅程	219
关于弗·伍尔芙的“存在的瞬间”	232
文学经典的解构与重构	
——论玛·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及其他	245
论玛·德拉布尔《七姐妹》的性别叙事策略	257
特色与反思	
——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	270
后记	281

第一辑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 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双重落差与文化学分析
- 命名的困境与阐释的焦虑：关于中国女性文学写作的界定研究
- 女性主义与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写作中母性主题的演变
- 弗·伍尔芙的影响与汪曾祺早期的意识流小说实验
- 伍尔芙与中国当代妇女作家的亲缘关系

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双重落差与文化学分析

如果我们将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博士学位论文《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0)的问世视为西方女性主义诗学成熟的标志,那么,它的发展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欧美一系列女性主义诗学著作纷纷问世,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在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美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的影响下,美、英、法等国的女性主义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体系,并在各自纵向的发展中又经历了横向的交叉与渗透,在当代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发展出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等纷繁多样的流派,被美国解构文论大师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肯定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三大模式之一。女性主义以其质疑、抗拒、解构父权文化的先锋姿态,坚守着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在崇尚削平“深度模式”、消解价值、普遍碎片化的后现代景观中,呈现出特立独行的特色。

然而,在中国大陆,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兴起,在世界范围的女性主义舞台上,此前基本处于缺席状态。通过翻检新时期最初几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报刊(包括专门的妇女刊物),笔者发现,关于妇女问题的报道并不鲜见,但总的来看均为有关特定社会新闻的报告,以具有道德教化意味的、宣传与劝诫性的文字居多,具备一定理论含量的专业化论述与学术分析几乎不见。

具体到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中国较早从事西方女性主义诗学译介的林树明认为,“1980年到1987年这段时间里,国内女性主义批评尚未形成一定规模”,“处于边缘的位置”^①。屈雅君主编的《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也指出:“至少从1985年以前的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著作及文章中,都还没有看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强有力的牵引。”^②林树明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980—1983年间的全国主要报刊上,有关此方面的文章约为5篇,1986—1987年间增至11篇左右。这一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当然可以存疑,另一方面,各人的选择标准与检索范围也未尽相同。但较之其他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女性主义诗学译介与研究起步之晚的事实却毋庸置疑。1986年以前,中国较有影响并得风气之先的文论刊物,如《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探索》等基本未见有关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译介文字,更遑论具有探索性质的文本解读实践。

就笔者所见,在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界颇有影响的《世界文学》杂志1981年第4期发表的朱虹在哈佛大学为其翻译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所作序言《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由于第一次引入了具有女性主义意味的“妇女文学”概念,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学术界最早介绍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文章。

该序言由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风行的“妇女文学”起笔,很快将笔锋转到了女权运动,明确地将妇女文学的繁荣看成是女权运动的直接成果,并进而对西方女权运动及其自然延伸到学术领域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兴起背景、基本特征、意义及影响等作

^① 林树明:《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上海文论》1992年第4期,第3—4页。

^② 屈雅君主编:《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

了概要的介绍。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研究美国文学的女性专家之一,朱虹当时身处女权运动的中心美国,敏感于“当前女权运动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十分可观”^①,预见到其对顽固的封建文化依然发生强劲影响的古老中国意识形态将会产生的冲击作用,故而将女性主义这一新的理论形态引入了国门。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预期使她高度关注女性主义的实践价值与人文精神,在当时英美女性主义诗学发展的实际基础上,正确地将其限定为一种注重历史、社会与文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批评模式。

从“妇女意识”这一中心出发,朱虹讨论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先驱人物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娜·德·波伏娃等的文艺观,历数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诗学中一系列重要著作,如玛丽·埃尔曼的《关于妇女的想法》、帕特里西亚·斯帕克斯的《女性想象:女性写作的文学与心理研究》、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蒂利·奥尔森的《沉默》、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谎言、秘密与沉默》等。虽然并未明言,但朱虹的梳理已经兼涉“妇女形象”批评与“妇女中心”批评两大主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她还慧眼独具,前瞻性地探讨了女性主义理论界至今尚未真正解决的一些问题,诸如关于妇女与“妇女文学”的界定,等等。虽然作者提出这一疑问的时候,解构理论、反对宏大叙事和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对美国学者关于女性、女性身份与特质的理解与界定的颠覆性影响尚不明显,解构理论本身也大约于1981年前后,才随着德里达等法国学者来耶鲁讲学而逐渐输入美国^②,但作者的学术敏感却是显而易见的。

朱虹的努力使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在萌芽初期便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但笔者根据对“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索引的检索发现,除朱虹外,早期译介中有分量与有影响的文字实属寥寥。总体来

① 屈雅君主编:《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第277页。

② 美国学者简·盖洛普(Jane Gallop)在《大约在1981年——学术化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Around 1981: Academic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中指出,美国女性主义学术圈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进法国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

说,在1986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与评述是零星而有限的,女性主义诗学的传播受到阻遏,尚未从整体上对中国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产生明显影响。

由此可见,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的繁荣与中国大陆滞后达十五年之久的沉寂,构成了第一重鲜明的落差。笔者认为,对这一落差,仅以“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专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为理由,并不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事实是,在中国历史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五四”以来被中断的中西文化交流再度恢复、并以前所未有之强劲势头影响了国人的视野、胸襟、思维方式乃至价值判断的时候,这一落差并未获得立即改变。

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人的视野与精神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自此,全国思想理论界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1978年底到1979年初,《文艺报》《文学评论》《上海文艺》等报刊相继发表一批结合文艺工作经验,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专栏文章,标志着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兴起”^①,而“进入8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是以开放性和建设性为主要特征的”^②。

“开放”的胸襟与“建设”的情怀使西方各种学术话语与理论思潮,成为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主要思想资源。“8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正是在外来文学和理论的冲击、影响和碰撞中,改变着它的观念和形态的。”^③西方数百年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呈历时性演进的精神文明成果,从古典的到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均在同一时空内被引入中国,一时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人们乐此不疲地译介西方理论形态与方法,而以1985年文艺界“新方法”年

① 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712—713页。

② 同上书,第742页。

③ 黄曼君主编:《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第742页。

的出现为高潮。这场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文艺研究新方法的讨论为先导并在 80 年代中期达到高潮的“方法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更新着文学批评观念,存在主义、现代派、意识流小说、新小说、结构主义等概念、流派、体系与方法纷纷亮相。1985 年,大量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探索文章集束性出现,如范伯群《新方法的介绍、移植和扎根》^①、吴亮《新模式的兴起和它的命运》^②、何江南《方法与现实的未来:由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想到的》^③、吴元迈《关于文艺方法论的思考》^④、陈晋、张筱强《近年来文艺学研究中六种方法的探讨概述》^⑤等。正是这一年,比较文学成为学界热点,并促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深圳成立。并称“三论”的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使学者们趋之若鹜,有关文艺心理学与接受美学,以及模糊数学对文艺美学之影响的文章亦比比皆是。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林林总总的“新方法”热中,女性主义同样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对女性主义的盲视甚至有意漠视,与文艺界的众声喧哗构成了第二重鲜明的落差。然而,中国学者突破庸俗社会学之藩篱,对西方众多文艺批评模式与研究方法进行推介与尝试的努力中,却依然并不包含女性主义。这里,笔者可以举出两例反证。其一:1985 年第 6 期《外国文学报道》的“新作简介”栏目发表了署名为微翁的文章。该编译器及时地跟踪报道了这部于当年 4 月问世、堪称“妇女中心”研究集大成之作、迄今仍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诺顿女作家作品选:英语传统》(*Norto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English Tradition*),但又并非从发掘、梳理妇女文学传统的女性主义意义上对其进行了肯定。相反,作者援引《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论,认为选目多有偏颇:“这部选集由于编者过于强

① 《文学报》1985 年 6 月 17 日。

② 《当代作家评论》1985 年第 3 期。

③ 《文学评论》1985 年第 3 期。

④ 《光明日报》1985 年 6 月 20 日。

⑤ 《文艺理论研究》1985 年第 3 期。

调了女权主义的意义,一意搜求以妇女经历为题材的女作家,因而不能全面地着眼于六个世纪以来所有的女作家,并从中选择最优秀的作品。两位编者把大量篇幅给予不大出名的作家的作品,或向来不为人看重的黑人、地区性、劳动阶级与美洲土著民族作家的作品——只要这些作品是主张或维护女权主义的。”今天,即便是一般的从事文学专业的学者也可以一眼看出,这一评价体现的是菲勒斯中心的立场。因为文选被编译者批评与否定的编选原则,正体现了女性主义学者有意矫正传统在经典作家认定上的偏颇乃至质疑经典本身的努力。颇有意味的是,在1995年随着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而被带动起来的中国女性研究高潮中,外国文学界最具权威性的杂志《外国文学评论》刊登了韩敏中评价同一部著作的文章,臧否标准显示出鲜明的差异。由《诺顿女作家作品选》在80和90年代的中国遭受的不同待遇,我们不仅看到了不同性别与持不同立场的学者在文学观念、标准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具体而微地看到了女性主义诗学在进入中国之后由被误读、被排斥而又渐渐获得生存权的历史进程。

其二是1985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揭幕的世界妇女大会在国内引起的反应及其与1995年北京大会的热烈反响形成的反差。对内罗毕会议,国内除了主要报刊有派遣官员出席盛会的报道外,并没有引发学术界关于妇女史、妇女学乃至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的热潮。这与十年后“女性年”的出现以及女性写作的繁荣判然有别。可见,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与群体心理期待尚未为女性主义思潮的进入作好充分的准备。

直到1986年之后,双重落差的局面才开始得以改观。邓伟志在《中国妇女报》1986年1月17日发表的《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一文,似乎成为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命运发生转机的美好预言。1986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文版问世,成为女性主义诗学进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成为其命运在中国的转折点。正是从该年开始,介绍与研究性的论文、论著不断增多,终致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在1989年左右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这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王逢振发表于1986年第3期《外国文学动态》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孔海立发表于沪版《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的《一股极为盛行的文艺思潮在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黄梅在《读书》杂志1987年第6、8、10期连载的系列杂谈《女人与小说》等；出版界对女性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也随之跟进，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被翻译过来，英国学者玛丽·伊格顿主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1987）中文版于1989年问世，成为第一部进入中国的女性主义文论选。1987年5月，“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与河南《妇女生活》杂志联合，在郑州召开了中国首届“妇女学学科建设座谈会”^①。中心的发起人之一李小江主编了一套“妇女研究丛书”，该丛书中最具学术价值、影响最为深广的当属孟悦与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该书深刻启发了中国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重新反思，促进了随后一大批具有女性主义意识与视角的文学批评著作的出现。“浮出历史地表”，亦成为后来我国女性主义学者在谈论女性冲破男权文化传统的禁锢，由弗洛伊德所谓的“黑暗大陆”浮出，确立主体意识时常常使用的一种表述。

于是，这双重落差便成为今天我们需要从文化学的高度进行反思的重要课题。在20世纪已然逝去的今天，我们该怎样阐释女性主义诗学这一异域的理论形态与批评模式进入中国之初遭逢的冷遇？

它不仅可以使我们从比较文化与文学的意义上，由一种异域文化与文学现象被传播至中国之初的遭际与命运考察中国受众的选择心理，反观其发生变异的文化语境，从而使我们对文化与文学现象传播、影响与接受的特点与规律有更客观的认识，亦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西女性主义诗学的不同特征，并为考察进入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这一与接受之初迥然不同的文化境遇的形成，提供一种文化学意义上的参照。

^① 《会议综述》，见《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5期。

笔者认为,造成双重落差的首要因素是中国民众(包括知识界人士)长期以来对“女权主义”这一概念的偏见和抗拒,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排斥倾向的群体心理障碍。

中国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回忆道:“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样有着某种程度的反感,或惧怕、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形象是一些丑陋不堪而又张牙舞爪的女人。”^①其实 Feminism 一词在汉语中并不具备对应的表述,译为“女权主义”只是在女性主义学说发展特定阶段的一种权宜之计,它并不能涵盖数十年来女性话语的多元发展以及通过反思父权文化,力图使男女两性均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的价值趋向。但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女权主义”中的“权”字被敏感而偏激地理解为女性为寻求霸权而向男性发难的努力,男女两大性别群体遂由长期的精神盟友分裂为对立的政治集团,女性主义学术话语在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的学术圈中引起天然的戒备甚至反感就不足为奇。这一“大众想象”在不少男性作家与评论家身上均有所体现。创作中的典型例子可见钱锺书小说《围城》中对所谓女权主义者有意无意的歪曲与丑化,评论界的交锋则可见戴锦华与王干的激烈辩论。

戴锦华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这是第一次,男性知识分子的群体的多数,无视、甚至反感各种有关妇女解放的提法,公开或半公开地拒绝女性主义。可能也是第一次,相当多的女性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漠然、宽容;而这事实上成了一种默许。”^②这就使女性主义的本

① 戴锦华:《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② 同上书,第142页。